

重拾哈耶克的思想遗产^{〔*〕}

——评韦森新著《重读哈耶克》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1990年代以来,国内译介引进了哈耶克大量著作,掀起哈耶克热。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是哈耶克1944年以后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后期对自由社会中的政治、法律、道德和政府的政治哲学思考,而早期哈耶克的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则较少涉及。韦森教授的新著则把一个完整的哈耶克介绍给国内读者,既重新梳理了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思想,又特别把哈耶克早期关于货币、信用与经济周期的经济纯理论研究进行整理呈现出来,以期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哈耶克。统一早期和后期两个哈耶克思想的是哈耶克一以贯之的,以演化论为隐含理论背景,探索“一个立足于自由制度基础的社会合作秩序如何可能”,即“自生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理论。

〔关键词〕哈耶克;政治哲学;纯粹经济学理论

20世纪经济学家中两大思想巨擘——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当代整个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超越了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也超越了他们所在的学科领域。前者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框架,后者则发展出具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特征的货币、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严厉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并建立了关于经济社会的自由理论和扩展秩序理论,被称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和“提出了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并足以影响科学进程,且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在公共政策层面,两位思想巨擘的观点针锋相对。每当大规模的经

作者简介:刘业进(197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

〔*〕本文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2012)以及“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三年行动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资助”(2013)。

济萧条来临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就一再被人提起和实际运用;每当政府干预甚至具有中央计划经济色彩政策手段抬头时,人们就会利用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发出强烈警告。韦森教授的《重读哈耶克》^[1]分别从政治哲学和纯经济学理论两个方面重拾哈耶克的思想遗产,对于后者,韦森教授把哈耶克置于其与凯恩斯的学术交锋中来展开论述,这是国内研究者长期以来较少关注的。

一、哈耶克后期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学研究

全书中作者用九个章节专门阐述了哈耶克基于经济学家背景的政治、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思想。

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捍卫者的布道式宣扬,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捍卫奠基于他独特的知识论和经济秩序理论。据此,哈耶克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通讯机制。市场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乃是因为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充分利用经济系统内客观上分立的个人知识。因此所谓劳动分工,其背后其实是知识分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竞争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恰恰是竞争这个被哈耶克称为“发现过程”的东西,引导资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经济系统之外,没有超级理性主体从事真实价格的计算和发现。竞争是发现任何要素和产品真实价格的不二法门,也是发现适当组织、制度、技术的不二法门。哈耶克的竞争理论并不旨在为市场布道,他的中心目标旨在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不可行性。如果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贫富差距、经济周期性波动、竞争导致的“浪费”等)放弃捍卫市场的立场,反而要在理性的指导下建设一种替代性的资源配置体制,结果会如何?哈耶克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在1930年代尤其是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予以严厉批判,认为一旦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就会导致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对真理的探索将受到人为的阻挠;亦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体制。抱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终将发现,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铺设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任何表现出高度有序的复杂系统背后都存在着一套规则体系。维持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条件是分立的财产制度和基于法治精神的宪法和法律。私有财产是表象,其实质是财产的分立,财产的分立与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分散知识的机制相联系。试想所有资源集中于一人之手或一个机构之手,就等同于删除了分立财产体制下无数分散知识的收集者和利用那些宝贵的分散知识的机制。不仅如此,只有分立财产权才可能发生真实的交易,交易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揭示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是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简而言之,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更一般地,分立的财产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以及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的一个必要条件。“无财产处亦无公正”(公正的问题主要是分立的财产权之存废问题和机会是否向才能开放的问题,这个理解与公正主要是

贫富差距问题的流俗理解大异其趣)。分立的财产制度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而个人自由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哈耶克指出了,合作秩序中市场、财产权、个人自由相互决定的基本事实。

哈耶克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基于演进理性主义,哈耶克坚信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之外不存在超级理性主体和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价格源泉,因此他猛烈地批评对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整体建构的做法——那是一种理性的致命自负。但是,无政府主义不是哈耶克的理论取向,相反,一个在法治下运行的政府和基于法治精神、法律和宪政架构是十分必要的。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制度中正式法律的显著特征是其作为抽象的一般行为规则,其抽象性表现为规则实施的特定影响不可预见。自由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法治下的自由。政府的主要目标旨在保护私有财产,一个没有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哈耶克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是,市场经济和先进的文明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哈耶克甚至认为,如果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平等地位上进行经营和竞争(虽然现实中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那么对国有企业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是哈耶克也认为,国有企业应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反对国有企业不是针对国有企业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国家垄断。

韦森教授对哈耶克的政府与法治思想作出如下精辟概括:法治是选民用宪法和法律使政府行为受到预先设定的宪法规则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制约,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此即为宪政。如前述,哈耶克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上要有所作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严格区分“法制”和“法治”。前者,法律仅是主权者进行社会统治和控制的工具;既然是工具,用与不用,如何使用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隐含着主权者高于法律。后者,指向所有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皆在系统之内,政府本身和所有其他行为主体皆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如作者所言,“法治近乎宪政”,“法治、依法治国、宪政共存于现代民主政体”。自由之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之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即政府守法),故此它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的限制。法治除了宪政之含义以外,还要求法律符合如下一般要求:法律必须是前涉性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法律是公知和确定的;法律的平等适用。

与柏林的消极自由概念接近,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个人不受制于别人尤其是政府专断意志和命令的强制而只受制于法律。在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自由是国家最高的善,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是所有其他价值的源泉和条件。作者总结道,“在哈耶克数十年的著述生涯中,以自由为轴心概念构筑起其庞大的经济社会思想体系,思路清晰精准,逻辑一致,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只存在于法治中。法治下的自由意味着人们的行动仅受一般正当行为规则的限制,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依赖于任何人或机构的权威的批准,只为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归根到底,自由之真义在于“等度自由”,即对自由的限制仅仅来自于别人也拥有的同等自由的限制,这不是一种自由的静态定义,而是一个需要在现实判例中反复检验的连续理性事实。法治之下,法律的目的不是消除和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然而,不幸的是,现代社会中法律概念外延扩展到取消法律的地步,如私法的公法化正是哈耶克所担忧的不良趋势。法治之下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具有法治精神的法律。如何甄别什么样的法律才是自由的法律和具有法律精神的法律?那就是看它是否尽可能扩展自由边界,直到受到“等度自由”的限制为止。无疑,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检验和巩固的过程,普通法传统正是这样一种检验机制和保存“沉淀的理性”的机制。

民主是保障自由的一种工具和方法,是制度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作者认为,哈耶克对自由、宪政、法治一直不遗余力阐释和弘扬,而对民主则一直有所保留。哈耶克认同保守主义有关民主的部分观点(虽然哈耶克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实际上其思想中包含着保守主义智慧),他认为民主仅在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体制下才是可能的,集体主义下民主必然趋于消失。民主具有否定性价值,即,有民主并不能必然保障自由,但没有民主对一个社会却是致命的。民主不是终极价值而是一种手段,是保障自由的手段和决策过程;民主是和平更换掌权者成为可能的一种惯例性安排。民主还是一个发现公共产品真实价格的机制,这一发现过程通过在时序上展开执政“特许权”竞争而实现。民主条件下,可以实现和平变革;民主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之一;民主是一种有关公共事务的意见形成过程。特别是,哈耶克注意到民主的价值在动态中而非在静态中得以证明。民主的益处只能在长时段内才能表现出来,在短时期内,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如其他政制那么迅速地形成。吸取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等人的思想,哈耶克警告,不要把民主奉为神明。当所有权力集中于个人之手、“阶级”之手或“人民”之手时,民主并不一定能保障自由。民主的最直接表达是多数统治——但是,哈耶克对此明确指出,多数统治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是政府形式中危害最小的一种。多数统治并不一定导致有限政府,当多数统治与无限政府相结合时一样能作恶。哈耶克认为,首恶乃是无限政府,任何人都无权行使无限权力。民主的要旨不在多数统治的形式而在于其有限政府的实质。

结合当代欧美国家议会机构功能的嬗变和广泛的福利制度导致的各种危机,作者梳理了哈耶克对政治思想、对西方民主政治深层问题的可能回答。哈耶克认为,西方国家所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其致命缺陷是政府实际上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不仅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也要限制立法机构的权力。因为立法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已经不再是制定和批准一般行为规则,而是指导政府在

解决特定问题时采取何种行政措施。议会机构功能的嬗变使得议员仅是各自选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本党派所采取措施的短期效果的宣传者,因此现代民主政体中的议会机构偏离了一般性法律的功能。在民主政体中,多数投票中出现的“互投赞成票”的行为被哈耶克斥之为赤裸裸的腐败。由于受制于选民支持的引导,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根本无力遵循一条一贯的行动路线。作者借此分析当代欧美各国出现的福利国家危机和政府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指出这些现象正是哈耶克所分析的“有了民主而逐步舍弃了宪政”的必然结果。为了解决现代民主政体面临的此一深层问题,哈耶克曾创造性地提出一揽子设想,以实现真正限制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权力:一是分设纯粹的立法机构与专管政府治理权事务的立法机构;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实行税收法定,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并使财政支出和用途受到政府立法机构的限制。

一种流俗的理解是市场经济要对道德败坏负责,作者指出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虽没有专门研究道德的本质和起源,但哈耶克有志于恢复自休谟和康德以来的道德哲学。哈耶克认为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社会才会弘扬滋长,也只有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运作。恰恰是自由社会不仅是守法的社会,也是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发祥地;恰恰是不自由的社会无一例外地产生对法律的不敬、对苦难的冷漠,甚至对恶人的同情。自由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对一般和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遵循并接受事先并不确定后果的回报。在这样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中,自由的人们建立起个人自由行动与个人责任的强力联系,一如哈耶克所说,行动自由和对行动负责使得道德情感能够培养、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得以强化。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实质。自由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而且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按照哈耶克的道德哲学理解,韦森教授指出了国人一些常见的误解,即认为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沦丧,由此期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并进行道德教化,以及主张暂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调。事实是,道德沦丧源自旧制度下资源按照权力等级配置的激励机制;而恢复和重建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建设自由社会中才能实现。

二、哈耶克早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没有人能看见全部世界,同样,没有人能知晓和把握一个经济系统的全部。哈耶克在早期纯经济理论研究中,在一度震惊了哈耶克的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著作的学习和对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学习中,以及在1920-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对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视经济系统为一个特例),尤其是对复杂系统高度有序化的信息基础——在经济中表现为相对价格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通讯机制(收集、传递、使用信息的机制)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在金融世界,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息传递着重要的关于有效配置资本的信息。

这里有一个知识背景需要交代。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当时都是在现行银行和金融体制背景下讨论,他们都默认了“合法”的部分准备金商业银行体系(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和基于货币国有化的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体制,作为无需质疑的前提。在这种金融制度下,部分准备金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不受真实储蓄支持的贷款实现信贷扩张,一旦发生挤兑,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出现。在这对共谋关系中,失去了中央银行支持它们就不能生存;而央行的存在有助于政府对于货币的工具化运用,甚至赤裸裸地获取通胀税。商业银行总是会受到来自国家和中央银行所提供的流动资金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现代世界的金融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奠基于商业银行普遍违背“不规则存管合约”和货币国有化基础上的央行垄断货币发行,以及政府和银行之间共谋和共生关系至上的体制。这种金融体制在微观经济上表现为在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资本价格信号误导下的资本品错误配置,最终表现为经济衰退,由此被迫通过周期性经济波动矫正来自于金融系统的错误,即可生产结构错误的周期性矫正不可避免。^[2]就算没有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现行金融体制本身就足以产生周期性的资源大范围错误配置以及以经济危机表达出来的对来自金融系统错误的矫正。哈耶克后来显然认识到当代世界整个金融体制的严重问题,于是他在1976年和1988年的著作中严厉批评了这种金融体制,并给出了似乎十分不现实的政策主张:货币的非国家化。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的批评毫不留情:“货币虽然是自由的人民相互合作的广泛秩序之不可缺少的要件,但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政府就十分无耻地滥用它,从而使它成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一切自我调整过程遭到扭曲的首要根源。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除了少数短暂的幸运时期之外,历来就是一部不断欺诈行骗的历史,同在竞争中供应各自货币的任何私人机构所能做出的事情相比,政府一直表现得更加不道德。”^[3]

在知悉这个知识背景的前提下,我们重温哈耶克早期有关“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纯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他与凯恩斯的论战。哈耶克-凯恩斯论战固然有理论本身的差异,但也有其各自亲身经历和关注焦点的差异。作者梳理了凯恩斯写货币三论的时代背景,“一战”打击了英国经济,尤其是1920-1922年的经济衰退重创英国经济,此后又接着经历1929-1931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英国的“慢性病”。凯恩斯还曾经在一战时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一战临近结束时,被财政部留下来建议如何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凯恩斯意识到严厉的经济惩罚蓄意让德国陷入贫困境地——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的可怕后果。凯恩斯甚至认为《凡尔赛合约》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一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种子。^[4]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最可怕的莫过于大规模失业。凯恩斯想要为英国病开出“药方”。然而与凯恩斯不同,在哈耶克看来,最可怕的莫过于通货膨胀。1920年代,奥地利经历了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1921年10月哈耶克开始工作,到1922年7月,八个月里哈耶克工资涨了200次。1919年1美元兑换16.1奥地利克朗,到1923年5月1

美元兑换 70800 克朗;1913 年奥地利一杯啤酒需要 10 亿马克)。斯人已逝,今天重温二位思想巨擘的论战,就关注焦点而言,哈耶克对问题重要性的敏感和把握更胜一筹。因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给定需求结构变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和失业乃是必然发生之事(经济系统中任何一种资源没有可能时时刻刻被充分利用从而不存在过剩也不存在供给不足,而凯恩斯念兹在兹的“充分就业”恰恰试图利用超越系统本身的力量实行人为的劳动力充分利用),一般而言,失业乃是一个自然事实(正如经济系统中任何一种资源在非均衡状态的情形),失业不涉及人为力量造成的财富转移,因而不涉及正义问题;而通胀则是存在一个垄断货币发行当局前提下通过人为的政策干预以实现意欲的政策目标,这种政策干预涉及财富转移,从而涉及正义问题。

韦森教授正本清源,澄清了人们对凯恩斯和哈耶克二位的一些常见误解。一是区分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后人发展和形式化的凯恩斯主义,二者不是一回事。二则,凯恩斯不是国有化支持者;不是宏观调控支持者;不是永久预算赤字支持者;也不是政府征税狂热支持者;他不主张通货膨胀而是希望物价稳定,主张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限制货币增长的方式达到物价稳定;他也不认为所有失业都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论战的另一方哈耶克,坚持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主张,但哈耶克并不主张人类社会好制度的演变上完全“无为”,并不主张全盘否定国有制,并不主张一定要绝对实行小政府,更不主张无政府主义。

受庞巴维克、维克赛尔和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分别在 1929、1931、1939、1942、1949 年出版《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价格与生产》、《利润、利息和投资》、《资本纯理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著作。哈耶克继承并发展了“货币中性理论”。他指出,现存货币的绝对数量和人类福利并无关系,因为货币没有什么客观价值。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商品作为收入的来源或满足欲望的工具其相对价值是如何受到货币的影响(或在特定条件约束下不受影响)。货币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不对商品相对价值发生影响——这就是货币中性。哈耶克特别强调的是,研究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币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货币理论的第一目标应当是阐明保持货币中性的条件。^[5]

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自然利率。简而言之,自然利率就是均衡利率,但是注意,真实资本市场上均衡点是不断变动的,没有任何市场参与者和机构能够时时刻刻准确跟踪真实利率。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方是储蓄(S),需求方是生产者投资对资本的需求(I),在不受人为因素影响下,资本供给(储蓄)和资本需求(投资)形成的马歇尔剪刀交点的均衡价格(供需相等)就是资本价格,换言之,I=S 时的均衡资本价格即自然利率。但在现代经济世界,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如欧盟)都存在一个垄断的货

币发行当局——中央银行,以及部分准备金存款合约银行体系下,在没有自愿储蓄自然增长作为支撑条件的信贷扩张成为当然,^[6]这一事实决定市场实际利率,也影响到真实利率水平。所谓自然利率只有在排除央行的人为影响下才会呈现,在现行体制下又是不可能的。如果央行不受逼近自然利率的强约束而是受到其他政策目标的指导(如保持某个给定的经济增长率或控制给定失业率水平),市场上的实际利率(现行银行体系下银行根据货币市场上的供求自行决定的利率)势必偏离自然利率。

根据货币中性和自然利率假说,哈耶克发展了一个“哈耶克三角”来阐明引入时间因素的生产结构理论。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生产要经过包含若干中间产品阶段的生产过程。哈耶克三角的左边纵轴表示迂回生产的阶段,底边横轴表示投入原材料价值,而斜边则表示各个时期生产最终消费品价值。按照哈耶克三角,生产越是迂回,即可投入的中间产品或中间环节越多,则需要投入的资本量就越多;如果靠近最终消费品的投资资本边际效率更高,生产的迂回结构就会缩短。哈耶克三角旨在说明生产的结构维度以及生产在真实时间中展开,而这恰恰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所忽略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有了这些知识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了。我们从消费者时间偏好这个自变量开始分析。如果消费者时间偏好下降即更偏好未来的消费,则 S 增加, i (利率)下降,引致生产者增加 I (投资),生产的资本化程度更高,生产迂回程度更高。反之则反是。在没有垄断货币当局人为扰动情况下,消费者时间偏好牵动着利率从而生产迂回程度的自发调整。现在引入一个垄断货币当局和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后者使得没有自愿储蓄的自然增长作为支撑的信贷扩张成为可能),当调控者为了实现理想政策目标(维持某个给定的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失业率或通胀率),如刻意增加货币供给,或人为压低利率,就是导致实际利率低于真实利率(自然利率)水平,把资源误导配置到资本化更高的生产过程中去(生产者根据已经误导的资本价格信号来投资),创造出人为的繁荣,结果资本品结构最终偏离终端市场上消费品结构而遭受清算,与此同时,被误导的资源配置必然伴随着就业结构的错误配置,结果中间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双双遭受更大规模的清算。那些相对于消费品结构被错误配置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表现为“产品过剩”,首先是那些远离消费品的中间产品投资者面临重大账面损失,这些账面损失反映出企业家所犯严重错误以及进行矫正的紧迫性,矫正过程需要通过停止错误启动的投资项目并将生产性资源从远离消费的阶段收回。与投资品相伴随的就业结构也需要相应的调整。这个变动传导到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大量失业(部分地可理解为就业结构试图调整到与最终消费品市场需求结构相匹配);传导到金融系统就表现为大量不能到期偿付的借贷,并可能进一步引发一个与原来信贷扩张相反的信贷紧缩过程。资源错误配置还表现为消费品的产生投资不足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而这又恶化了远离新货币注入点人群的收入水平。最终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哈耶克不否认凯恩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在短期内增加就业,但哈耶克指出,如此操作的后果等于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宏观调控当局制造的人为的资本价格信号(名义利率)与资本供需力量产生的价格信号(真实利率)对生产者而言是无法明确区分的,在利润引导下生产者也无意做这样的区分。长期看,这种误导下的投资必然导致与消费品市场结构脱节,市场自我清算和纠错迟早要来临,这种清算和纠错以通胀和更大规模的失业收场。虽然通胀整体上有害,但是要看到那些首先从增发货币和信贷扩张中得利的利益集团对于刺激政策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们能在短期内从通胀政策中大获其益,等到增发货币和信贷蔓延到整个经济体,他们的利益已经得手。

在“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货币论》、《通论》)中,凯恩斯的理论作如下展开。当国民收入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储蓄增加,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人为控制的变量)与资本边际效率(市场自发调整的变量)的关系,而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人们对资本的预期收益,当投资者出于投资前景缺乏信心时,就会导致投资不足,这样导致储蓄不能全转化为投资;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业还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因此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周期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不是利率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导致经济危机。为免于这种崩溃降临,凯恩斯大胆建议——投资的责任不能置于私人之手,同时还要求采取政策措施刺激消费,总之,扩大有效需求。

于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央行对银行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管理,调控利率、改变投资者的预期,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使储蓄与投资相等($S = I$)。现行体制下投资责任由政府承担。当资本边际效率持续下降时,应当实行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以及各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凯恩斯认为,面临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要在短期内把经济从萧条中解救出来,通过降低利率和财政刺激是必要的。显然,凯恩斯的政策取向是使繁荣尽量持续,以及尽量缩短乃至消除萧条,为此不惜引入政府直接干预之手。

而哈耶克则认为,正是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和人为压低贷款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传达误导性的资本价格信号(央行的货币政策导向从来就不是使得市场货币利率逼近真实利率水平,它也无从知道真实利率水平是多少),导致投资者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误判,引起不当或过度投资,最后导致经济系统的生产结构失调。(凯恩斯针锋相对地认为,是市场自发运行中的资本边际效率——真实利率与人为控制的市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的背离导致萧条)只要实际利率(现实中即受到央行控制的利率)等于均衡利率也就是真实利率,则货币就是中性的,从而保证物价稳定。其实,在快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若没有垄断货币当局的调控因素和其他宏观刺激政策,中性货币条件下,某些物价会因技术进步而下降从而出现通缩跌,相对价格体系也会因技术进步而调整。就这一点

而言,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哈耶克和凯恩斯都声称继承和改进了维克赛尔的思想)断言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时物价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的观点是大可置疑的。货币中性条件下,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是某些商品价格持续下降且相对价格也会相应自发调整。

于是哈耶克提出具有显著消极特征的政策主张:经济衰退是经济系统中投资错误的天然疗伤药,是消灭那些得不到真实储蓄所支持的投资的净化器。不要通过人为操控利率来配置资源导致投资扩张,除非为了保持货币中性所必需的限度,货币量的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

维克赛尔的这一见解是对的,(给定存在一个垄断货币发行的央行)“要不断更换银行利率,使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真实利率)保持一致。”但是凯恩斯则错误地继承和发扬了维克赛尔的观点,认定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取决于投资和储蓄是否相等,而这又取决于银行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为此,要对银行体系进行管理,操纵银行利率来影响投资,以使投资等于储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最初始的自变量是哪个?政府如何获知不断变动中的真实利率信息?这又回到了哈耶克强调的复杂系统中的信息与通讯问题。

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论的焦点在于,哈耶克认为,自然利率就是均衡利率,而决定均衡利率的,是人们消费和储蓄时的时间偏好,正是这种时间偏好决定消费和储蓄之比,也就决定了消费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结构;利率和资本化程度均受到可用投资的生产资料的稀缺和富足程度的影响;生产者需要做的是根据对消费品和资本品需求的变化以及资本品稀缺程度信号制订生产计划。而凯恩斯认为自然利率就是“资本边际效率”或“资本边际生产率”(实际上,在一个已经存在垄断货币当局和已然实施调控政策的经济系统中,无从观察到统一的“资本边际效率”经验数据)。预期消费和投资总和构成所谓“有效需求”,其中投资和消费是经济系统中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所决定的变量。凯恩斯认为经济系统的初始自变量是以上三个,其中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稳定,所以是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利率的波动解释了萧条和繁荣的交替。当资本边际效率(我们看来就是真实利率)突然崩溃时萧条就会发生,而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是无法人为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

真实利率(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哈耶克的“利润率”)是那些不为人知的、难以经验验证的因变量,不能人为操控。而实际利率在现行银行体系下可以人为操纵——但操纵的倾向必须明确,即货币利率必须逼近真实利率水平。当货币利率高于真实利率,导致资本供给大于资本需求;当货币利率低于真实利率,则导致资本供给小于资本需求。如果货币利率的调整不服从于逼近均衡利率法则而是服从于外在目标,如充分就业或物价水平,那么货币利率会以更大概率长期偏离均衡利率水平,导致资本品的长期错误配置,进而导致经济周期反复发生。

哈耶克赞赏同为自由主义盟友的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政策建议,比如“学

券制”，但哈耶克不赞成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货币数量论仍然是总量分析，过份关注通胀和通缩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而忽略了向经济系统中注入和撤出货币数量对相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它没有看到通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进而扭曲生产结构而导致失业，也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恰当。这无疑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货币中性理论的一个自然结论。

综观全书，看得出作者对哈耶克思想的倾向性。但作者仍对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提出了批评：即哈耶克是否一方面假定了生产者能对价格（利息）信号做出即期理性反应，而另一方面又隐含假定市场中的可用资源是无限供给的？否则无法推导出利率降低引致错误投资的结论。哈耶克的理论实际上假定了生产者既是理性的又是短视的。而对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作者提出，如果市场参与者是理性又是长远眼光的，那么刺激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大打折扣，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维持极低的利率，结果投资和经济增长依然萎靡不振就是明证。

三、结 语

韦森教授在中文世界首次全面剖析哈耶克和凯恩斯两大经济学家的论战，深入阐述了哈耶克早期关于货币、信用与经济周期的核心思想。经济学大家往往关注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经济学议题，所以，哈耶克的思想至今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当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否无动于衷？——是的，长期看来，暴风雨终将过去，风和日丽的日子迟早来临。在宪政框架和民主预算的强力约束下，政府是否需要对付肆虐的暴风雨采取必要的临时性措施？2008年以来，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爆发，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乔治·布什总统旋即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接踵而来的是抗议政府举债救灾的声音。我们必须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走钢丝，既要避免迫在眉睫、千钧一发的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灾难，又要避免临时性措施永久化而滑向通往奴役的不归路。韦森教授新著的出版无疑将提醒我们重拾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哈耶克早期纯经济学理论成就，厘清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误读和误解；也将有助于负有改革和增长双重任务的中国面临经济社会复杂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关系。

注释：

- [1] 韦森：《重读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
- [2] [4] N·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34、12页。
- [3]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 [5] 哈耶克：《价格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页。
- [6] J·H·德索托：《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责任编辑：力 昭〕